

王士菁 著

中国

文学史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

从屈原到鲁迅的通俗讲话

中国工人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延庆

封面设计：佟昭丽

ISBN 7-5008-2880-2



9 787500 829805 >

ISBN 7-5008-2880-2/1 · 833 定价：29.80元

中国文学史

——从屈原到鲁迅的通俗讲话

王士菁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史:从屈原到鲁迅的通俗讲话/王士菁著.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9

ISBN 7-5008-2880-2

I. 中… II. 王… III. 文学史-中国-通俗读物 IV. I209-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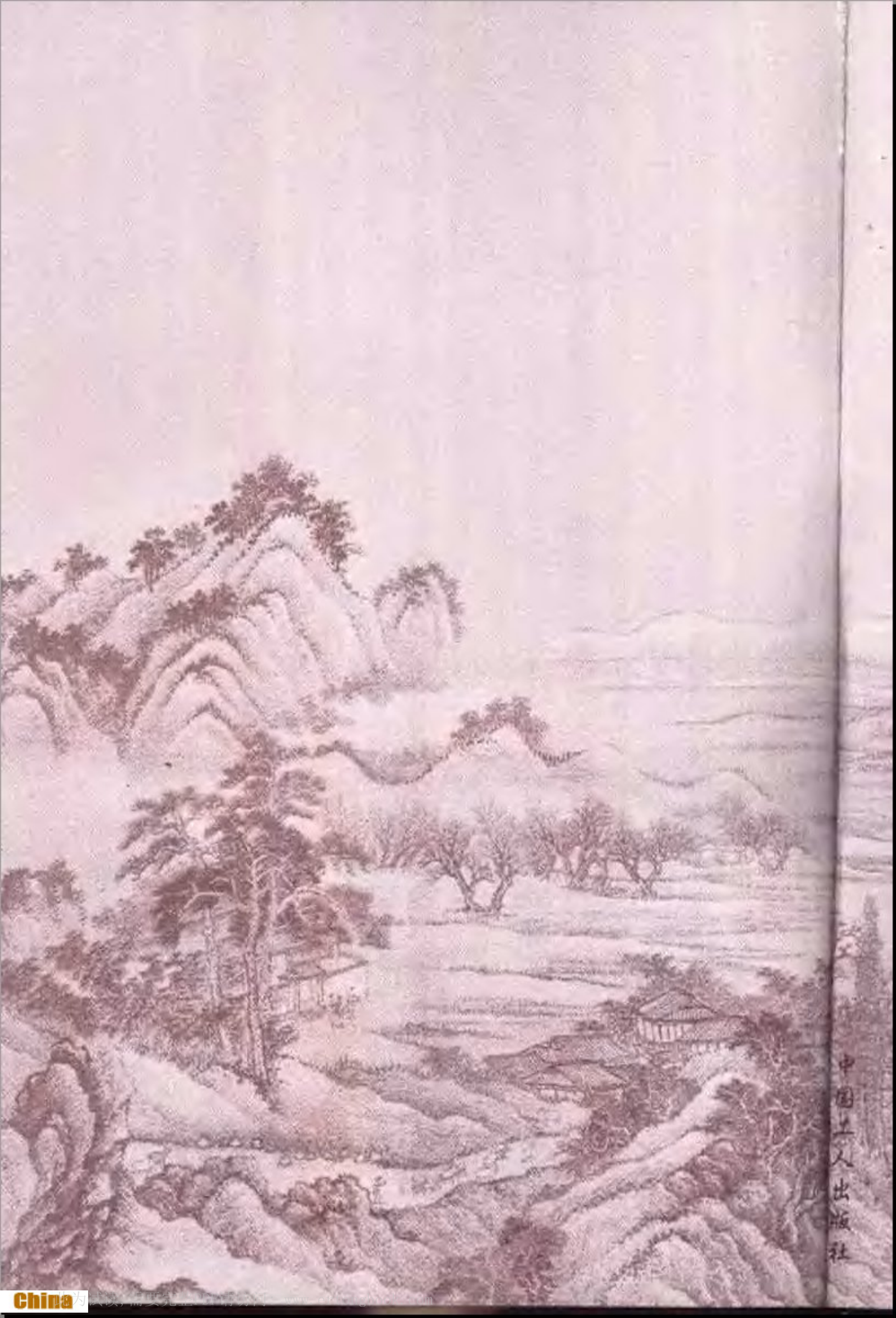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0758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62350006(总编室) 62005038(传真)
发行热线: (010)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 数: 350 千
印 张: 14.25
印 数: 001—4000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中国工人出版社

王士菁，1918年生，江苏沭阳人。1943年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北京、清华、南开）大学中文系。在朱自清、闻一多先生指导下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在党的领导下参加学生民主爱国运动。

解放前，曾从事党报的编辑和记者工作；建国后，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负责中国古典文学和鲁迅著作编辑工作。又曾任广西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文学系主任；鲁迅博物馆馆长，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已退休，仍从事研究工作。

著有《鲁迅传》、《瞿秋白传》、《唐代文学史略》、《杜诗今注》；长篇历史小说《雨霖铃》、《小天堂的毁灭》等。



中国文学史

——从屈原到鲁迅的通俗讲话

王士菁 著

目 录

写在前面	1
第一讲 中国文学的起源	13
第二讲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37
第三讲 我国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	67
第四讲 古代人民的幽默和讽刺	87
第五讲 汉魏六朝的无名诗人	111
第六讲 五言诗的兴起	137
第七讲 古小说钩沉	167
第八讲 “文学的自觉时代”	197
第九讲 诗歌大国里的诗歌	219
第十讲 唐诗	235

目 录

第十一讲	宋词	275
第十二讲	元曲	309
第十三讲	宋元的戏曲和话本	329
第十四讲	明清传奇	345
第十五讲	明清小说（一）	365
第十六讲	明清小说（二）	383
第十七讲	明清小说（三）	405
第十八讲	民族的觉醒与复兴	419
结束语		444

写在前面

中国文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中国文学的历史——编写此书的主要目的在于为初学者提供准确的历史知识，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文学主流的发展规律和作家创作的经验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文学应占有适当的位置。在各族人民中间曾经产生过一些著名的或无名的诗人、散文家、小说家、戏剧家和说唱家。他们以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和说唱文学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作品，不断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化、文学和艺术。二十四史的“艺文志”和“文苑传”不断记录下他们光辉的业绩；历代公私藏书机构虽屡遭兵火战乱，仍保存了丰富的文化典籍；此外，还有埋藏在地下的，更有待我们去发掘；流传在各族人民口头上的，也有待我们去搜集和整理。这一切都是我们各族人民应该引以为自豪的文化遗产。

对于这一些文化遗产，自古以来，历代有识之士即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并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不同程度的整理，其中着重论述作家和作品的专论或专著不断出现。近代以来，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出版了许多新型的不同于“艺文志”或“文苑传”的

文学史著作，对历史上的作家和作品进行较有系统的论述。大致说来，从清末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所编讲义《中国文学史》开始，其后流行较广的有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1918年，中华书局印行）、胡适的《国语文学史》（1927年，北京文化学社印行；后又改名为《白话文学史》上卷，1928年，上海新月书店印行）、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0年，商务印书馆开始印行）、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1949年，中华书局陆续出齐）等等。此外，在全国解放前，还有以“断代史”、“专史”等各种不同内容和形式、篇幅也繁简不一的文学史多部，如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1915年，商务印书馆印行）、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1920年，北京大学出版部印行）、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年，商务印书馆开始印行，为当时大学丛书之一）等等。这也是我们丰富的文化遗产。在上述这一些方面，许多前辈学者都曾付出过辛勤的劳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此外，在解放前，我国新文学奠基人鲁迅也曾写过一部《中国小说史略》，在他生前又曾想写一部中国文学史。著名的诗人、学者和民主战士闻一多，在他的生前，也曾想写一部很有特色的中国文学史。很可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都没有能够实现这一宿愿，但他们也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这一些意见至今仍值得我们重视并且有待深入进行探讨。

在鲁迅逝世之后不久，冯雪峰在《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一文中曾经写道：

“关于中国文学史，鲁迅先生恐怕从写《中国小说史略》的时候已经开始准备，收集材料了罢。……我只知道一九二七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曾写过一个大纲，不过似乎是为讲授用的，断片的研究也曾发表过一篇，而想写文学史及想如何写法，则到上海以后，却时常谈起，但有些材料鲁迅先生都集

一中到北平去，最后两年则在上海又购买了为查考用的许多书籍。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之间，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时候，他常常谈的多是文学史方面的问题。……这时他很有即开手写的趋向，因为他曾说：‘或者先写 sketch，像《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那样，一断片一断片的写起来再说……’但终因为别的在他看来是更紧迫的工作所牵制，并没有实现他的宿愿；而且到他逝世前也仍在同样情形下，不克实现他的计划。”^①

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在给许广平的信（1926年9月14日）中，曾经写道：

“我的功课，大约每周当有六小时，因为语堂希望我多讲，情不可却。其中两点（即两小时的授课时间，下同。——引用者注）是小说史，无须豫备；两点是专书研究，须豫备；两点是中国文学史，须编讲义。看看这里旧存的讲义，则我随便讲讲就够了，但我还想认真一点，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②

鲁迅在定居上海时致曹聚仁的信（1933年6月18日）中，又曾写道：

“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此种物件，都须褫其华衮，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乌烟瘴气，莫名其妙。其他如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文祸史……都未有人著手。然而又怎能著手？居今之世，纵使在决堤灌水，飞机掷弹范围之外，也难

① 《片断回忆》，1937年10月15日于上海。见《雪峰文集》第4卷第20—21页。着重点是引用者加的。

② 《两地书》四一。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117页。着重点是引用者加的。

得数年粮食，一屋图书。我数年前，曾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各一部，先从长编入手，但即此长编，已成难事，剪取款，无此许多书，赴图书馆抄录款，上海就没有图书馆，即有之，一人无此精力与时光，请书记又有欠薪之惧，所以直到现在，还是空谈。”^①

许寿裳先生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五）《杂谈著作》中，更详细地谈到鲁迅准备编写中国文学史的情况以及他列举的计划中的部分章节目录；也由于上述的原因，这部中国文学史仍未能完成。^② 鲁迅计划中的中国文学史虽然未能完成，但他在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中，关于编写文学史的主张，关于文学史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他对于作家和作品的意见，至今仍值得我们重视。特别是因为这一些意见来自他对于社会生活的细致的观察，来自他的变革社会的实践和长期文学创作所积累的经验，那就不是一般的泛泛之谈了。他的一些真知灼见，对于我们编写中国文学史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集诗人、学者与民主战士于一身，最后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的闻一多先生，也曾想写一部具有特色的中国文学史。他晚年在昆明几个大学曾经作过一系列的通俗讲演，从屈原到鲁迅都有所论述，这便是他构思中的中国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可惜，他为了中国人民崇高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没有完成正在构思中的中国文学史。他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为初学中国文学史的学生着想，同时也为广大的关心文学遗产的读者，特别是为初学者着想，先从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入手，“说明背景”，“诠释词义”，“校正文字”，使读者读懂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然后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

^① 《致曹聚仁》。见《鲁迅全集》第12卷第184页。

^② 参看《亡友鲁迅印象记》第52—53页。

艺术技巧和社会意义，为他们提供准确的历史知识。他的广为人们称道的《诗新台鸿字说》这篇著名论文，即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例。他的《古典新义》等专著，也都是从这一些方面为读者着想，因而取得的科研成果。如《周易义证类纂》、《诗经新义》、《离骚解诂》等著作，对于我们阅读和理解古典文学作品，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认为：“较古的文学作品所以难读，大概不出三种原因。（一）先作品而存在的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因年代久远，史料不足，难于了解；（二）作品所用的语言文字，尤其那些‘约定俗成’的白字，（训诂家所谓‘假借字’）最易陷读者于多歧亡羊的苦境；（三）后作品而产生的传本的伪误，往往也误人不浅。”^① 他的《古典新义》等著作，主要即是为了解决有些读者阅读古典文学作品的困难问题。记得在做学生初读《诗经》时，闻先生向我们介绍的人门书，即有清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同时还有“高邮王氏父子”的王念孙和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和《经传释词》等书，即是为此目的。记得在做学生时，闻先生还不断提醒我们：认识古代汉字对于读懂古典文学作品是非常重要的。不懂不要装懂，千万不可望文生义。强不知以为知，害人害己。他以身作则，从“新月派”诗人自觉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历史的考据”方面，从唐诗扩展到《诗经》、《楚辞》；后来，“他于是读卜辞，读铜器铭文，在这些里面找训诂的源头。”^②这便是他走过的从诗人到学者的道路。闻先生的这一些意见，对于我们编写中国文学史，在方法论上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朱自清先生也特别看重中国人自己编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文学史。他在为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所写的序言中说：

^① 《楚辞校补·引言》。见《闻一多全集》（二）第341页。

^② 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见《闻一多全集》（一）第17页。

“早期的中国文学史大概不免直接间接的以日本人的著述为样本，后来是自行编纂了，可是还不免早期的影响。这些文学史大概包罗经史子集直到小说剧曲八股文，像具体而微的百科全书，缺少的是‘见’，是‘识’，是‘史观’。”^①朱先生对于闻先生为了探究中国原始社会生活，曾对古代神话进行研究，如《伏羲考》、《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等著名论文，这一些方面所取得的科研成果，非常赞扬；对于闻先生运用唯物史观来探讨中华民族原始文化尤为重视，曾着重指出：“他不但研究文化人类学，还研究佛罗依德的心理分析学来照明原始社会生活这个对象。从集体到人民，从男女到饮食，只要再跨上一步；所以他终于研究起唯物史观来了，要在这基础上建筑起中国文学史。从后来关于文学的几回演讲，可以看出他已经是跨着这一步。”^②

闻先生又曾把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分为四大阶段八个时期，从本土文化的黎明期开始，纵观“外来影响”与“民间影响”，展望未来的“世界性的趋势”，准备写出一部体大思精，气魄雄伟的唯物史观的中国文学史^③。正在他已经“跨着这一步”，“然而他为民主运动献出了生命，再也来不及打下这个中国文学史的基础了。”朱先生回忆说：“就在被难的前几个月，他还在和我说要写一部唯物史观的中国文学史。”^④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闻先生的这部中国文学史虽然没有写成，但在他留给我们的许多著作中，关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家与作品的精确考释和论证，也非泛泛之谈。他的一些真知灼见，对于我们编写中国文学史也

① 《朱自清文集》（三）第208页。

② 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见《闻一多全集》（一）第18页。着重点是引用者所加。朱先生在这里所说的“关于文学的几回演讲”，即指闻先生晚年在昆明几个大学所作的关于从屈原到鲁迅的一系列的通俗讲话。

③ 在他的遗稿中有一个提纲，但未形成详细的有系统的论述。现编入《闻一多全集》（新编十二卷本）第10卷第22—36页。

④ 见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见《闻一多全集》（一）第14页。